

敌人用一辆黄包车将林青拉赴刑场，并惨无人道地用短刀横卡在他的嘴里，妄图阻止他的宣传。利刃刺穿了他的两腮，殷红的鲜血，不停地从他的嘴里流了出来，流了出来……

林青



一代骄子

□ 吴世祥

林青，这位贵州地下党的早期领导人，他只活了短短的24个年头。然而，他却用他这极其短暂的生命，为如何生活，如何斗争，如何选择生与死等一系列做人的重大原则问题，写下了令后人景仰的答案。因此，他的一生虽然是那么短暂，然而却是那么的无比辉煌！

林青，原名李远方，小名毛么，后因同志们爱叫他毛哥而取名矛戈，1911年出生在贵州毕节县城的一个贫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无力供他上学，林青13岁时，不得已到同一县城的志和百货商店当学徒。这种学徒生涯是极其悲惨的，名曰学徒，其实是老板家的勤杂工。每天天不亮起床，夜深了也不能睡觉。挑水、劈柴、洗衣服，甚至还要洗老板娘的臭裹脚布。这种非人的生活，在林青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强烈反抗的种子。1926年，在商店里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学徒生涯的林青，终于再也忍受不了商店老板的剥削和压迫，于是15岁的林青毅然逃出了志和百货商店。他随着一批贵州挑夫，经过十分险要的川黔古栈道去重庆，他要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地。

到了重庆，林青参加了一个话剧团。此时，北伐战争捷报频传，革命力量迅速发展，而反革命力量也在进行着拼死的反抗。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刚攻下南京，帝国主义的军舰就炮轰南京城，我军民死伤两千多人。消息传来，全国人民为之震怒，抗议的浪潮此起彼伏。3月31日，重庆人民在通远门外打枪坝集会，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林青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这次集会，竟然遭到了四川军阀的残酷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大刀挥舞，鲜血横流。军阀的暴行，使林青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心灵里的那颗反抗的种子，升华了。

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不久，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林青所在的剧团因上演进步话剧而被迫解散。林青便改名李肃如，考入重庆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林青在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漂泊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亲娘，林青从此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

1930年，林青到了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上海，在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接上团组织关系后，在沪东团区委工作。他联系了在上海的贵州人金孝远，乐石麓等同志，组织了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朝阳音乐社”。他白天做工，晚上就和音乐社的同志们一道到沪东或沪西等工人住宅区演唱抗日歌曲。由于他在革命工作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1931年，林青光荣地被转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取名林青在党内使用。这一年，林青20岁。

林青的抗日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2年，因人告密，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判刑两年。在狱中，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吴黎平。在吴黎平的指导下，林青认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次年，因英王加冕，林青获得特赦，提前半年出狱。出狱后的林青，一时找不到工作，又和组织联系不上，便邀约了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的同乡缪正元同志返回家乡毕节，决心在家乡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贵州高原上的毕节，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活动风起云涌。离家7年的林青，一回到久别的家乡，就立即投身到家乡滚滚的抗日救亡浪潮中去。他发展了在毕节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秦天真同志入党。1934年1月，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林青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从此，贵州各种进步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抗日救亡活动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这时的林青，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他写下了对革命斗争充满必胜信心的诗句：

真理被“道德”欺骗，
两种人类各在一边，
愿将满腔热血，
换来幸福人间！

林青在毕节进行的革命活动，积极而卓有成效。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宣传革命的群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林青鲜明地提出：文艺要走出象牙之塔，歌吟不唱靡靡之音，演戏要演新戏，绘画要画刚强的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在林青的领导下，草原社在毕节演出了反封建的话剧《七姐妹》，抗日救亡话剧《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火的洗礼》等。草原

社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毕节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林青领导的毕节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驻扎毕节的反动军阀犹禹九的注意和仇视。1934年夏天，林青和草原社的骨干被迫离开毕节，到安顺和遵义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攻占遵义。消息传来，林青喜不自禁，立即满怀激情奔赴遵义。担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吴黎平同志，正是林青在上海坐牢时的同牢难友。难友相见，那一份惊喜，那一份激动，那一份同志亲情，真是用言语难以表达。他们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眼圈儿便都红了。

吴黎平带着林青会见了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同志（李维汉）。林青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罗迈同志代表党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的活动，并指示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从此，贵州地下党组织就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

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建立后，林青回到贵阳，找到打入敌军做电台工作的缪正元同志，要他抄出敌人的密电码交给红军，为红军胜利地突破敌人的围剿做出了贡献。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妇女会刊物《惊蛰》主持编辑了一期文章，旗帜鲜明地号召“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反对法西斯统治！”这期《惊蛰》，在贵阳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打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这一年的7月19日，林青和省工委委员刘茂隆同志不幸被捕。

敌人抓住了林青和刘茂隆同志，如获至宝。当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书记长陈惕庐和警备司令郭思演设下一桌盛宴，妄图以高官厚禄收买这两位年青的共产党员，从而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面对敌人的利诱，林青和刘茂隆冷若冰霜。他们昂然而立，拒绝就坐。陈惕庐，这个我党的可耻叛徒厚颜无耻地对林青他们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你们年纪轻轻，何必为共产党断头呢？”林青慷慨答道：“我们和你们各是两个人，得不出公论。你们安排一个公共场合，就是你们省党部的大礼堂也好，参加的人全是国民党员也行，我们来进行一次辩论，如果你们能辩胜，我们就跟你们走。”林青说罢，和刘茂隆转身便走，气得大叛徒陈惕庐狂叫：“好

吧,我就只好成全你们的名节了!”

敌人对林青和刘茂隆搞“软板凳”、“踩杠子”,用尽了各种酷刑。可是,他们就是撬不开这两位年青的共产党员的口。穷凶极恶的敌人,就将他们判处了死刑。

林青和刘茂隆被打入了死牢。偏巧,看管死牢的狱警中,有一位叫董亮清的人,是一位与党失去了联系的地下党员。当他得知了林青和刘茂隆的身份后,便决定营救。唯一的营救办法是,借押送犯人上厕所时寻机逃走。然而,按牢规,一次只能押送一个犯人上厕所,也就是说,林青和刘茂隆,他只能救走一个。那么,救谁走呢?两个都是优秀的党员,两个都是那么年轻的同志,董亮清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他都无法作出决定。不得已,他只好将这个难题交给了林青和刘茂隆同志。

是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啊?这是生与死的选择!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回答这一题目,而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面对着这生与死的选择,林青与刘茂隆,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却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冷静、从容,表现出了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伟大精神。他们是那么平静地将生留给对方,自己义无反顾地选择死。

林青对刘茂隆说:“你的组织能力强。你走,你出去对党的事业有利。”

刘茂隆对林青说:“你是贵州党的书记,应当是你走,你出去对党的事业更能发挥作用。”

但没多久,林青和刘茂隆同志被分开关押了。刘茂隆由董亮清看守。一天傍晚,董亮清押着刘茂隆上厕所,经过林青的牢房时,林青站在牢门口,深情地举手向刘茂隆同志致意。

刘茂隆同志越狱成功,林青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中秋之夜,他怀着对党深深的眷恋之情,写下了《合唱》一诗:

用我心声的音波,
传给我的母亲。
就是这样,
你在东头,我在西头,
我们都是这时代教成的牢囚。
当着这中秋是一年一度呀。
人间天上毕竟有条鸿沟。
见着这污屎桶,

仍就精神抖擞,

我们这儿没有眉毛一弯、唇儿一绉。

当月影拖着一条尾巴倒在这墙角的时候,

最好是起来同奏一个合唱曲。

尽你所有的歌喉,

凭着西风的遥送,

传到母亲的心中!

1935年9月11日,疯狂的敌人决定对林青下毒手了。

刑场设在六广门。从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到六广门,沿途荷枪实弹的军警林立。经过不知多少次严刑拷打的林青,由于伤势过重,已经无法行走了。敌人用一辆黄包车将他拉赴刑场。敌人万万没有料到,一出警备司令部,林青就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接着,又高唱《国际歌》。高昂激越的口号,雄壮庄严的歌声,响彻贵阳上空。敌人恐慌了,敌人害怕了,敌人竟惨无人道地用短刀横卡在他的嘴里,妄图阻止他的宣传。钢铁铸就的年青的共产党员林青,强忍着钻心的剧痛,仍然艰难地一路呼喊着口号。利刃刺穿了他的两腮,殷红的鲜血,不停地从林青的嘴里流了出来,流了出来……

林青的鲜血,是那么红,是那么艳,它染红了贵阳,染红了贵州!

敬请阅读

著名文化人冯骥才主编的《文学自由谈》是一本表达文坛民意的刊物,一本被视为中国文坛窗口的刊物,一本独立特行、充满激情的刊物,一本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一本有众多大知识分子与众多小知识分子自费订阅的刊物。凡有雅兴结识该刊的朋友,来信夹寄五角钱邮票,便会收到一份98年最新几期要目,以帮助您了解该刊的基本面貌。索阅者请于信封上写清地址、姓名、邮编,寄:300040天津市新华路237号《文学自由谈》李桂珍。该刊邮局订阅代号:6—111。

电话:(022)23395034